

# 目 录



|           |     |
|-----------|-----|
| 总 序 ..... | 季羨林 |
|-----------|-----|

|           |   |
|-----------|---|
| 前 言 ..... | 1 |
|-----------|---|

|                     |    |
|---------------------|----|
| 第一章 中国服饰的起源问题 ..... | 14 |
|---------------------|----|

|                                      |    |
|--------------------------------------|----|
| 第二章 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与<br>长江流域服饰文化初步 ..... | 23 |
| 第一节 长江流域地区的服装纤维 .....                | 26 |
| 第二节 长江流域地区的纺织工具 .....                | 35 |
| 第三节 长江流域地区原始服饰的基本面貌 .....            | 45 |

|                            |    |
|----------------------------|----|
| 第三章 商周时期长江流域服饰文化述略 .....   | 56 |
| 第一节 商及西周时期服饰文化概貌 .....     | 56 |
| 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服饰文化 .....       | 60 |
| 第三节 东周时期南北服饰文化的融合与交流 ..... | 77 |



#### 第四章 长江上游青铜时代的服饰文化(一)····· 84

##### 第一节 古代蜀国历史渊源····· 84

##### 第二节 三星堆遗址与古蜀国文明····· 86

##### 第三节 三星堆遗址与古蜀国服饰文化····· 90

#### 第五章 长江上游青铜时代的服饰文化(二)····· 105

##### 第一节 古滇国的纺织工具····· 106

##### 第二节 古滇国的纺织技术与工艺····· 111

##### 第三节 古滇国的纺织面料及纺织物····· 115

##### 第四节 古滇国的服装····· 118

##### 第五节 古滇国的服装饰物····· 121

##### 第六节 服饰文化与古代滇国的民族构成····· 130

#### 第六章 长江中游青铜时代的服饰文化····· 140

##### 第一节 楚国丝织业发展概貌····· 141

##### 第二节 楚国的服装····· 153

##### 第三节 楚国的服装饰物····· 173

#### 第七章 长江流域秦汉时期的服饰文化····· 189

##### 第一节 秦汉时期中国服饰文化的基本面貌····· 189

##### 第二节 秦汉时期长江流域服饰文化····· 201

|                             |     |
|-----------------------------|-----|
| 第三节 江陵凤凰汉墓出土服饰 .....        | 260 |
| 第八章 长江流域少数民族服饰文化 .....      | 266 |
| 第一节 长江流域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巡礼 .....    | 271 |
| 第二节 长江流域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几个问题 ..... | 316 |
| 结语 “被褐怀玉”与“文质彬彬” .....      | 331 |
| 参考文献 .....                  | 342 |



# 总序

阳翰笙在担任全国文联领导工作的同时,1954 年他又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 (简称对外文协) 副会长、副组长。 (和他原来工作的中国人民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是同套班子,两块牌子)。同时还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委员。阳翰笙开展了大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接待了众多的国际友人。在五、六十年代,我国受帝国主义的“封锁”,许多国家尚未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阳翰笙等出色地执行了我国的民间外交政策,仅通过文联这个群众团体的名义就和 60 多个国家的进步文艺团体建立了密切联系;与 25 个国家、48 个文艺团体及文化界人士开展了互访活动,举办了 44 次世界文化名人的纪念大会。在精选出国的演出团体、节交关系,阳翰笙等出目,特别是戏曲方面的,阳翰笙花费了许多阳翰笙在担任全国文联领导工作的同时,1954 年他又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对外文交关系,阳翰笙等出化协会 (简称对外文协民) 副会长、副组长。 (和他原来工作的中国人民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是同套班子,两块牌子)。同时还被交关系,阳翰笙等出任民命为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委员。阳翰笙开展了大量的对外文化交流义的“封锁”,许多国家尚未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阳翰笙等出色地执行了我国的民间



同套班子,两块牌子)。同时还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委员。阳翰笙开展了大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接待了众多的国际友人。在五、六十年代,我国受帝国主义的“封锁”,许多国家尚未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阳翰笙等出色地执行了我国的民间外交政策,仅通过文联这个群众团体的名义就和 60 多个国家的进步文艺团体建立了密切联系;与 25 个国家、48 个文艺团体及文化界人士开展了互访活动,举办了 44 次世界文化名人的纪念大会。在精选出国的演出团体、节交关系,阳翰笙等出目,特别是戏曲方面的,阳翰笙花费了许多阳翰笙在担任全国文联领导工作的同时,1954 年他又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对外文交关系,阳翰笙等出化协会(简称对外文协民)副会长、副组长。 (和他原来工作的的中国人民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是同套班子,两块牌子)。同时还被交关系,阳翰笙等出任民命为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委员。阳翰笙开展了大量的对外文化交流义的“封锁”,许多国家尚未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阳翰笙等出色地执行了我国的民间外交政策,仅通众团体的间外交政

李羡林

2003 年 01 月 03 日

# 前言

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到寿终正寝,一般要度过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漫长岁月。在此期间,人最主要的生活内容,智慧的中国人用“衣食住行”4个字就基本上涵盖无遗了。由此可见,衣也就是服饰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的确,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服饰文化,与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道德、生活方式以及审美取向等诸多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表现出风格各异特征。内容宏富的中华服饰文化,是中国漫长历史中每个历史阶段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文化,又是科学,更是一种艺术,是一种具有特定意义和功能的文化载体。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漫长的历史,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众多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团结大家庭。在华夏广袤的疆域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民族内部,由于社会发展进程不一,自然条件和气候状况千差万别,风俗习尚各有千秋,反映在服饰本身及由此衍生的服饰文化就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

任何一个民族的服饰文化,首先是特定的民族心理、风格、气质、个性的物化反映;其次是特定的时代风尚、民族宗教和信



仰崇拜的再现,或是对某种历史功绩的纪念的生动体现,代表着当时人们对理想王国的寄托、追求和向往。

通观中国的服饰文化,无不以其美、雅、艺、精、智的特色,著称于世。

美:中国古代服饰艺术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美化生活。

雅:中国古代服饰艺术具有东方艺术的雅韵,更独具万物生机的内蕴和礼仪化、典雅化的特色。

艺:中国古代服饰式样繁多的图案,艺术地再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鸣、天人合一的理念。

精: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以最简洁的文化要素和服饰线条,展示生活的美感与社会人伦的风范。

智:中国古代服饰精巧的设计、别具匠心的制作、独特的款式和品位标志以及各种服饰礼仪与禁忌,均是中华民族群体智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显现。

具体而论,中国古代,从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的深衣,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窄衣大袖、袴褶、漆纱笼巾、幅巾;从北周、隋唐的软脚幞头,女子的窄袖衫襦及胡服,男子的缺胯、加襴式袍衫,到五代至宋的展脚幞头,宋代女子的窄袖褙子与辽代的髡头饰物,到元代的古古服、质孙衣、左衽袍;从明代的圆领窄袖袍衫、六合一统帽,到明清官宦的补服、清代女子的旗袍、男子的瓜皮帽、女子的花冠等,这些林林总总的织料各异、工艺有别、雅尚纷呈的历代冠服袍饰,以其独特的色彩、光耀、图案、形体诸文化与科学元素,不仅展示了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和生活、艺术美韵,显示出古代人们对大自然求索的科学成就,而且还逐步形成了以“礼”为其文化核心,以“用赏性”为其文化心态的服饰文化系列。

正是因为服饰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独特的地位及其深厚的文化意蕴,对服饰文化包括服饰名物、服饰制度、服饰礼俗、少数民族服饰及服饰流变等的研究,就一直是学者们关注和研究的热门。

点。早在 1700 多年前的汉代,学者刘熙就在其著作《释名》里,对秦汉以前的服饰名称、样式、质料、用途以及演变过程都作了比较详尽的考释,对当时已经失传的服饰进行了缜密的考订、辨伪和正名工作。《释名》全书不到 30000 言,其中关于服饰就有 150 余条,是研究古代服饰的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官修正史、典制文献及稗史笔记里关于服饰的记载也可谓是俯拾即是,洋洋大观。其中,从《礼记》、《周礼》,到汉代的《三礼图》、《急就篇》和晋代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从唐代欧阳询等人编纂的《艺文类聚》、虞世南的《北堂书钞》、杜佑的《通典》,到宋代李昉的《太平广记》和《太平御览》、王应麟的《玉海》、无名氏的《锦绣万花名》;从元代的《元典章》和明代王圻与王思义的《三才图会》,到清代清世祖敕辑的《子史精华》、陈元龙的《格致镜原》、张英等人的《渊鉴类函》;以及从《史记》到《清史稿》等“二十五史”的“舆服志”,均为世界各国历史所罕见。

中国历代服饰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对中国历代服饰遗产的钩沉整理和研究,不仅能为中国的历史研究、古籍文献整理、文物鉴定、艺术创作提供一份宝贵的资料,同时有助于人们形象地了解古代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情况,有助于人们认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有助于人们审美观念的提高。所以,到近现代,在中国学术界又掀起了一个服饰研究的新高潮,出版了一大批资料详备、见解精到的学术论著,如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周锡保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史》等,进一步拓展了中国服饰文化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综观先哲时贤对中国服饰文化的研究,其方法有以下几种:一是中国服饰文化的总体研究,包括服饰的起源、发展、服饰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等等,如沈从文先生的《中国





古代服饰研究》<sup>①</sup>、周锡保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史》<sup>②</sup>、黄能馥、陈娟娟合著的《中国服装史》<sup>③</sup>等即是；二是中国悠久历史长河中某一个历史阶段的服饰文化研究，这是取一种断代研究的方法，如张末元先生的《汉代服饰参考资料》<sup>④</sup>即是；三是中国服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如华梅先生的《服饰与中国文化》<sup>⑤</sup>即是；四是对中国境内众多少数民族绚丽多姿的民族服饰文化的专门研究，如戴平先生的《中国民族服饰文化》<sup>⑥</sup>即是；五是某一区域范围内某一历史阶段的服饰文化的研究，如彭浩先生的《楚人的纺织与服饰》<sup>⑦</sup>、朱新予先生的《浙江丝绸史》<sup>⑧</sup>等即是。而取中国境内的某一条大江大河的流域范围作为对象，去研究该流域内服饰的发生与演变、服饰文化与区域文化的关系以及该流域内服饰文化在中国服饰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等等，这样的努力前人尚未作过。本书《长江流域服饰文化》正是这样的尝试之作。

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华民族的又一个摇篮，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所作的长江流域服饰文化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进行的。

研究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地区已是人类活动频繁的地区，人们在此劳作繁衍、生生不息，创造了独具风采、足可与黄河文明并肩媲美的长江文明。在长江文明的画卷里，服饰

- 
- ①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1981年。
- ②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
- ③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
- ④ 张末元：《汉代服饰参考资料》，人民美术出版社，1960年。
- ⑤ 华梅：《服饰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
- ⑥ 戴平：《中国民族服饰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 ⑦ 彭浩：《楚人的纺织与服饰》，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 ⑧ 朱新予：《浙江丝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文化是其中最为夺目的图画之一。

不断出土面世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六七千年前,长江流域的人们就和黄河流域的人们一样,已经初步认识并且开始利用动物纤维和植物纤维如蚕丝、麻、葛等作为人类早期服装的面料。

尽管有关蚕及蚕丝的起源问题,目前尚无定论,但迄今所知的考古资料,已有力地支持着长江流域是中国最早进行植桑、养蚕、治丝的地区观点。在认识蚕丝、葛、麻这些动物纤维和植物纤维的特性以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人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纺轮作为纺绩纤维的工具。纺轮及配合纺轮使用的横杆、拈杆合称纺专。纺专可以说是人类最早使用的纺线工具,是现代纺织业里广泛使用的纺锭的鼻祖。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纺轮,不仅数量多,而且制作精美,很多纺轮上都刻有纹饰或施以不同颜色的彩绘,光彩炫目,令人爱不释手。仅从彩陶纺轮的装饰这一点,就可以说明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原始纺织业的进步与发达。而精心彩绘、充满艺术气息的彩陶纺轮,似乎也昭示了长江文明浪漫放达的先声。

继原始纺线工具——纺轮之后,长江流域的先民在掌握并使用原始纺机方面又一次走在中华民族的前列。

距今六千多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一批木器,包括木刀、圆木棒、木杆等,做工精细、形制规则、保存完好<sup>①</sup>。经过对比研究,它们与目前生活在云南的彝族、海南的黎族仍在使用的织布腰机上的构件几乎一模一样,应当是原始腰机上的打纬刀、卷布木辊和提综木杆。这些出土的木器基本上可以复原成为一架性能完好、工作正常的腰机。浙江余姚河

---

<sup>①</sup>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姆渡遗址出土的原始腰机,说明在纺织技术方面,长江流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已经走在中华民族的前列。因为原始腰机的出现,表明真正意义上的纺织技术的诞生。自此,人类才正式踏入穿着服用纺织品的时代,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

无论是长江流域,还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人们的服装样式与色泽,目前尚难确定。据汉代学者郑玄等人推测,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已经基本走出了“未有麻丝,衣其羽衣”<sup>①</sup>的时代,进入了戴冠穿衣、佩挂首饰的文明生活状态,此即《易·系辞下》中所说的:“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之乾坤。”<sup>②</sup>乾即天,坤即地。天在凌晨未明时为玄色,上衣像天而服用玄色;地为黄色,下裳像地而服用黄色。这种上衣下裳的服式和上玄下黄的服色,就是由对天地的崇拜产生的服饰样式与颜色。

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推测出这一阶段人类上衣下裳的基本形制和玄衣黄裳的基本色泽。而与服装配套使用的饰品,我们又可以通过地下出土的文物得到一些基本的认识。

如果从北京山顶洞人遗址出土的红色穿孔饰物算起,服装的饰物与服装的起源基本上是同步发生、发展的<sup>③</sup>。在新石器时代的许多遗址里,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饰物,材质包括石、陶、玉、骨、蚌、角、木等,种类包括发饰、耳饰、项饰、佩饰、臂饰、手饰、带钩、额箍、面饰、冠饰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饰物出土的数量、种类远胜于黄河流域地区,其中以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为中心区域的良渚文化各个遗址出土的各类饰物尤其丰富,可视为长江流域同期服饰艺术的佼佼者。

① 《礼记·礼运篇》。

② 《易·系辞下》。

③ 贾兰坡:《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

品种丰富、造型精美的服装饰物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长江流域服饰文化的发展水平当不在黄河流域之下。

约在公元前 21 世纪,中国社会进入原始公社解体阶段,夏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在夏朝统治的 400 余年间,社会生产力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夏亡商立,商朝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得到较大发展,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殷商文化。继商之后,周代是我国奴隶制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社会生产力较之商代更有大幅进步。

夏商周时期特别是商周时期,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震荡与变化,作为人类社会生活重要内容之一的服饰也不例外。商代的甲骨卜辞中,有“桑”、“蚕”、“丝”、“帛”等象形文字,还由此衍生出 100 多个有“系”字偏旁的字。除了这些单字之外,还有一些有关蚕桑的完整卜辞<sup>①</sup>和祭祀蚕神的卜辞<sup>②</sup>。河南安阳大司空商墓和山东益都苏埠屯商墓都出土过玉蚕<sup>③</sup>。这些甲骨卜辞和玉蚕,昭示着一个准确无误的事实:商代已经具备比较进步的丝织技术。

进入周代,随着分封制的确立,等级观念逐渐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制度也渐次产生。如此,衣冠服饰也就慢慢突破原来单一的实用性功能,渗入了区别尊卑、昭明身份的社会性功能。

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制度逐步取代了奴隶制度。在此期间,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春秋五霸此起彼落,战国七雄合纵连横。与这种

---

① 胡厚宣:《卜辞同文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9 本,1947 年;《殷代的蚕桑和丝织》,《文物》1972 年第 11 期。

② 胡厚宣:《殷代的蚕桑和丝织》,《文物》1972 年第 11 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 年。



政治风云相适应,各阶级、各阶层和各集团的代表人物从自身的立场出发,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张和思想理论,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的现象。诸子百家所诤辩的论题主要是天人关系、今古关系以及礼义法度等等。这些思想文化领域的纷争,也对当时的衣冠服饰制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儒家提倡“宪章文武”,主张一切言行举止包括衣冠服饰都必须“约之以礼”,以维护当时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荀子就直接提出:“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镂,皆有等差。”儒家还特别重视服饰美,大力强调“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儒家这种对服饰社会性功能及服饰外部美的追求,受到了道家和墨家的非难和诘问,如庄子就提出“圣人被褐怀玉”,强调人内在的道德美、品格美。墨子则直接指出:“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他主张服饰及其他生活器具只求“尚用”,不必追求奢华修饰,更不必拘泥于繁缛的等级制度。

这种思想文化领域的论辩,反映到当时的服饰文化方面,就是异彩纷呈,各行其制。诚如《淮南子·览冥训》所言:“晚近之世,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sup>①</sup>《墨子·公孟篇》则进一步具体化:“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絺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纓,绛衣博袍,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sup>②</sup>可见当时列国服饰风格迥异,特点鲜明。实际上,检之文献,还可以发现很多有关列国之间不同服饰习俗的文字记载,如齐国自齐桓公始,规定举国上下皆穿着紫色服装,导致紫色衣帛售价腾跃,出现了“五素不得一紫”的局面,即五匹素色丝帛抵不上一匹紫色丝帛的价值;魏

① 《淮南子》卷六,百子全书本,扫叶山房 1919 年刊行。

② 《墨子》卷十二,百子全书本,扫叶山房 1919 年刊行。

国的风尚是男子内着黑衣,外罩白衫,黑白分明;楚国流行戴高冠,即屈原在《楚辞》中所谓“冠切云之崔嵬”;赵武灵王更是独树一帜,别出心裁,他效仿胡服,改易服制,领一时风气之先等等。

正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列国服饰文化上的差异性,使得我们更有可能对长江流域春秋战国这一时段内的服饰文化作出比较准确的勾勒与描画。我们选择的研究方法是以考古发现的地下材料为主要线索,辅之以相关的文献资料,尽量全面地捕捉当时服饰文化的点滴信息,努力复原斯时斯地人民衣冠服饰的风貌。为此,我们选取了云南晋宁石寨山(包括云南江川李家山)滇国墓地、四川广汉三星堆古蜀国遗址和以湖北地区为主的楚国墓葬这三处古遗址或古墓葬群落作为研究、解剖对象,试图达到见微知著、以一斑而窥当时各地服饰文化全豹的目的。

地处云南昆明滇池侧畔的晋宁石寨山及江川李家山墓地,由于“滇王之印”的出土,被认为是明确无误的滇国墓地。这两处墓地所出土的各种遗物基本上可以反映云南青铜文化的大致轮廓<sup>①</sup>。令人振奋的是,在这两处墓地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中,有不少是反映当时人们服饰穿着情况的器物,特别是反映滇国人民饰物、发式等方面的材料尤其丰富,它们是研究滇国青铜时代人们服饰情况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位于成都平原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掘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发现了包括大型城址、大面积居住区及祭祀坑在内的重要遗迹若干,特别是一大批制作精美、风格独特的青铜器和玉器的出土,令人耳目一新,也震惊了整个世界,真可谓是“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sup>②</sup>。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三星堆遗址代表了一

① 张增祺:《云南晋宁石寨山》,云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

②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支内涵丰富、体系独立、特征鲜明的区域性地方文化。它不仅显示了三星堆遗址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中心,而且代表了古蜀文明的最高成就。同样,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里也出土了数量众多的服饰文物,同样折射出古蜀国服饰文化的发展水平。

云南晋宁石寨山及江川李家山墓地和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批服饰文物,我们不妨把它们视作青铜时代长江上游地区服饰文化的载体。以这两处遗迹的出土文物作为出发点,辅之以相关文献,大致可以勾勒出青铜时代长江上游地区服饰文化的基本面貌。

长江滚滚东流,冲出西陵峡口,“其流奔放肆大”,进入丰腴肥沃的中游地区。而风云际会的春秋战国之世,正是楚文化崛起于长江中游之时。楚人在公元前 11 世纪立国之时,还是一个地处偏僻的蕞尔小邦,但在此后的几百年间,楚人“筚路蓝缕”,奋发图强,一跃成长为一个泱泱大国。在楚国的鼎盛时期,曾经领有东达东南沿海,西至渝东,北抵河南、山东,南邻广东、广西的广阔版图,一度成为战国七雄之长。此时的楚文化已经具备完整的形态和鲜明的风姿,在中华大地上独树一帜。此后直至战国晚期,楚文化始终是长江文化的表率。

从目前研究的成果来看,在我国古代同时期众多的区域文化中,楚文化一枝独秀,领先同侪。楚人在采矿、冶炼、丝绸、漆器等方面取得了罕有其匹的成果。特别是在服饰方面,楚人丝绸刺绣艺术绚丽斑斓、惊采绝艳,显示出其惊人创造力与想像力。1982 年,湖北江陵马山 1 号楚墓出土了一大批丝织品,充分地展示了东周楚国服饰文化的高超技艺与审美趣味<sup>①</sup>。马山 1 号楚墓因此被誉为先秦地下“丝绸宝库”。

<sup>①</sup>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 年。



如前所述,楚文化在东周时期具有极强的影响力与辐射力,楚风所及,余韵悠长。因此,我们以楚国服饰为研究个案,以剖析东周时期长江流域中游地区服饰文化的发展状况。

公元前 221 年,秦军灭掉齐国,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群雄并起、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秦始皇建国伊始,痛感列国制度不一,各行其是,一派车涂异轨、律令异法、田畴异亩、衣冠异制、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混杂局面,便下令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端正风俗,全国出现了“车同轨,书同文”的统一、有序局面。但秦王朝仅仅维持了十几年,公元前 202 年,便被刘邦建立的汉朝所取代。

汉朝建国之初,衣冠之制未备,如帝王百官参加祭祀,仍沿用秦朝旧制,不分尊卑,均穿黑色之衣。自汉高祖刘邦开始,历经文帝、景帝、武帝数朝,一直有官员上书朝廷,奏请更改历法、服饰等礼仪制度,但因国力空虚,这些建议未被采纳。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长江流域地区的文化形态基本上可用“既承秦制,又袭楚风”这 8 个字来概括。那么秦及汉代早期长江流域地区的服饰情况又是怎样的面目呢?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及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服饰文物,表现了此时此地服饰文化“既承秦制,又袭楚风”的鲜明特征。

东汉明帝永平二年(59),根据《周礼》、《礼记》、《尚书》等文献记载,“定南北郊冠冕车服制度”<sup>①</sup>。按照这个制度,在这一年举行的祭祀汉光武帝的仪式中,明帝及公卿列侯依次服用冠冕、衣裳、玉佩、履舄。皇帝冕服用 12 章,三公诸侯 9 章,九卿以下 7 章。从此,礼服之制有章可循。也就是说,从东汉开始,随着封建集权制的进一步加强,全国大一统的局面日益强化,包括服饰

<sup>①</sup> 《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





在内的各种行止都被归入严密、有序的制度格局中。这些制度反映在历代官修史书上,就是《舆服志》、《车服志》、《礼仪志》、《五行志》、《仪卫志》中的相关内容。舆原意是车厢,后引申为车,服即衣冠。舆服在古代是车乘、章服、冠履的总称。舆服制度是每个朝代巩固国家统治、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制度之一。《舆服志》体裁首创于《后汉书》,此后的《晋书》、《旧唐书》、《宋史》、《金史》、《元史》、《明史》直至《清史稿》中都辟有《舆服志》。《舆服志》的主要内容是记载每个朝代关于车乘、章服、冠履的有关规章制度、尺寸规格、款式形制及颜色等,它在一定程度上真实记录了历史进程中服饰的演变、发展情况。

正是在如《舆服志》所记载的严密制度的规定下,东汉以降,直至清朝,各个朝代的服饰被严格地限制在舆服制度制订的框架之内,按章执行,不得逾越规矩半步。所以,在这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内,长江流域地区与长江流域地区以外的服饰,基本上是大同小异,趋于一致。所谓大同,就是在严格服饰制度规定上的统一风格;所谓小异,就是因为气候、物产等自然方面的原因,造成服饰上的一些细微差异,如北方草原及东北地区人民多穿着毛皮,中原人士多服用布帛,而长江流域地区人民好用丝绸;又如,因气候的原因,北方服装一般是大袖长袍,而南方服装一般是窄衣短裙,等等。

可以说,自东汉以后,长江流域地区的服饰在全中国服饰文化的总格局中,特征不彰,风格不显,甚至可以说是乏善可陈。因此,在这一部分,作者着墨不多。

倒是绚丽多姿的长江流域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值得大书特书。长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诸多少数民族安居乐业的家園,他们在此繁衍生息,各自创造了风格别具的少数民族文化。其中,少数民族的服饰造型别致、颜色丰富、饰物多样、文化深厚,真可谓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如果说长江流域的服饰文化